

中國共產黨歷史參考資料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中共黨史教研室 編
社會科學資料室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中國共產黨歷史參考資料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中共黨史教研室 編
社會科學資料室

中 共 中 央 高 級 黨 校

1957年2月

目 錄

中共中央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張(1924年9月10日)	(1)
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張(1924年11月19日)	(7)
中国工人階級的力量(1924年11月)	邓中夏 (12)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大会宣言 (1925年1月28日)	(25)
中共中央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殘暴的大屠杀告全国 民众(1925年6月6日)	(29)
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階級斗争(1925年9月11日)	瞿秋白 (35)
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1925年9月)	瞿秋白 (41)
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張 (1926年7月14日)	(56)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宣言 (1927年5月)	(68)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回忆 (1937年3月21日)	康 生 (79)

中共中央第三次对于时局的主張

我們早已看透了中国的病根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剝削操縱及国内軍閥之扰乱，非人民起来以革命的手段外而反抗列强内而解除軍閥之政权及武装，別的方法都是藥不对症，白費力气。

然而短視而又懶惰的国民，总喜欢在国民革命以外，費尽气力試用各种藥不对症的方法，考驗的結果，至今只有空言和平免战，結局仍旧移家逃难丧失生命財產，別无办法！

在直皖直奉两次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安福派及奉張完全失勢，在表面上似乎是中国政治上进步的現象，实际上却不然，因为打倒安福派与奉張并非由于人民的力量，乃是由于另一部分軍閥曹吳背后挟着英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当时国人迷信曹吳，以为借重他們而国民自己不費气力便可以达到統一和平的希望。殊不知世界上絕对沒有不劳而获的事，軍閥曹吳佩孚和帝国主义的英美勾結为患的局面之下，只有去統一和平更远；因此，我們第一次發表对于时局之意見，主張全国革命分子結成联合战綫，繼續民主的革命战争，以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及国内一切軍閥为中国民族解放之唯一的道路。

曹吳佩孚眼見国民很容易被他們欺騙，得了政权以后，反动的局面日益严重起来：压迫北京知識階級；以武力及陰謀扰乱川湘閩粵；惨杀京汉罢工工人；驅逐他們自己所利用为傀儡总统的黎元洪；至此，直系軍閥之罪才为国民所認識。此时，国民依旧不信任自己的力量，同时又找不出第二个像以前所崇拜的吳佩孚，遂轉而出于消極否認及国会南迁等懦弱无能的办法，即避开革命的办法；

因此，我們第二次發表對於時局之意見，主張由國民黨或人民團體出來號召一個國民會議，開始以國民革命的新局面來解決一切對外對內的政治問題。

直系軍閥，腐敗政黨外交系及帝國主義者，都看破中國國民懦弱無能，遂敢於沉湎一氣，進行中外古今所希有之公開的賄選。曹錕賄選成功將近一年以來的成績是：

- (1) 承認列強臨城案的要求，以為列強承認賄選之交換條件；
- (2) 力謀承認威海衛案，金佛郎案，宜陽丸案，以取得帝國主義者的援助；
- (3) 利用趙恆惕楊森吞噬湖南四川；暗助周蔭人陳炯明擾亂閩粵；
- (4) 因袒護賄選議員，名捕安徽全省學校學生數百人，并累及其家屬；
- (5) 向外商進行津赤，烟雜，滄石三路借款；
- (6) 在天津購買意大利軍械，價值五百五十萬元；
- (7) 吳佩孚派人強提膠濟路款，以充由廣東降北之海軍軍餉，并濫提鹽款，強截捐稅，種烟販烟；
- (8) 解散膠濟鐵路工會，并逮捕及开除工人多名；
- (9) 因擁護曹黨私人北洋大學校校長馮熙運，直隸省長派出保安隊，包圍學校，驅逐學生，逮捕學生代表；
- (10) 曹錕的妾舅任意毆傷鐵路人員，曹錕的衛隊任意打死警察；
- (11) 在漢口鄭州石家莊逮捕工人楊德甫孫雲鵬等七人，在北京逮捕張國燾等五人，均未宣布罪名；
- (12) 禁止學生着白色衣白布靴走过新華門，禁止北京戲館唱

演“捉放曹”“打鼓罵曹”“徐母罵曹”等戏；

(13) 接受日本公使的照会，通令全国严禁人民于“五七”

“五九”开会纪念国耻；

(14) 容纳列强干涉中国商标之要求，商标公报用英文，商标局聘外人为顾问，对于李义元陈魁元及英艦炮击万縣等案之丧权辱国；

(15) 办理德發債票案，国庫損失至少三千万元，收回前存倫敦拟付德債之款，悉作軍用；

(16) 重禁京沪所出多种新書新报；

(17) 为办金佛郎案，縱令王克敏迫孙宝琦去职；

(18) 向美国購运大批軍火价值三百二十八万元，又購德国軍火三百五十大箱；

(19) 力持以造路名义攫取各国退回的庚子賠款；

(20) 縱令齐燮元兴师攻浙。

此次齐燮元兴师攻浙，当然不是一般人所說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其战争之实际性質，是直与反直的軍閥間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國爭斗之开始。

我們不可迷信中国的軍閥真有独立作战之可能，——倘有此可能，已应有一个軍閥主义的独立国家。每次內战都有国际帝国主义爭斗的背景。国际帝国主义，欧战后以英美法日四国为其代表；他們在中国的关系：从前独霸远东的英国只須保守其既得权利已足惊人；与英爭霸欧洲大陆的法国現时工業状况，中国虽还不是他必以死力爭的市場，然而也不是可以忘情的肥肉；在中国竞争最烈的乃是欧战中驟然澎湃的美日两个帝国主义。因为种种的关系，法国与日本站在一边，英国与美国站在一边。日本是帝国主义中之最

幼稚者，還有結托中國統治階級以政治的支配達到經濟的侵略之必要；美國是侵略中國之後至者，全中國已沒有他回旋的隙地，所以也必須援助一派軍閥，樹立他在中国政治的勢力，以傾復他在中国經濟的敵人——日本。華盛頓會議美國給日本第一次大打击，直皖奉直戰爭，美國給日本第二次大打击，自此以後，美日在中国的勢力消長，我們當已看出；此次直系興師攻浙，乃是美國給日本第三次總結束的打击。

賄選前（去年五月），美公使曾到保定府和曹錕接洽最高問題；賄選前（六月），美總統哈丁表示美銀行團可助中國統一的意見；賄選成時，美使首先稱賀；列強為曹政府以武力制止廣東政府分取關余時，美國最出力；直系爪牙趙恆惕將失長沙時，以炮艦拒譚助趙的也是美國；以大批軍火運到天津給吳佩孚的也是美國；以大批軍火運到廈門給直系軍隊的也是美國；和齊燮元進行導淮借款的也是美國；美國扶助直系是不可掩的事實，此次助直興師統一中國（不只是對浙），乃是結束一切可与日本接近之政治的勢力。

這次戰爭的爆發是與美國國務卿休士赴倫敦所訂關於處置中國之密約（見本月五日路透社）有直接關係；而於英國帝國主義此時勾結廣東商團以圖推翻孫中山之舉尤足證明。我們再看戰前直與反直兩方之財政與軍火的準備：英美贊助曹吳解決德發債票外，英福公司與吳佩孚訂定的道濟借款為百五十萬鎊，美公使替該國商人与吳佩孚做成的軍火買賣為步槍一萬枝子彈二千萬顆，機關槍二百五十架，而吳佩孚的飛機隊完全由美國人替他組織與訓練，並且與蘇齊進行導淮借款。日法軍火之輸入奉浙（最近張作霖向法商訂購快槍三千枝，子彈六百萬發及其他軍用品若干），早已成為公開的祕密，而奉浙飛機隊之發展顯然法國人為主持，故上次法飛行家杜氏來華，備受奉浙之優待而遭齊燮元嚴厲之反對。至於張作霖與日

本之祕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吳与英美。張作霖与日本訂約，任其在滿洲取得三十年租借权，以換得軍火与財政之援助；而齊燮元于宣战时更向美国宣言下沪后任美国在沪設立无綫电台。故此次战争直接是直系与反直系的战争，間接乃是英美与日法帝国主义的战争。

在开战的兩方：直方于数省人民水災待救不遑中，大兴排除異己之师，殘害人民，自然是此次战乱之罪魁禍首；浙方虽宣布討曹而非反直，实际上当然是反直战争。反直战争，在目前政治現象上虽然是必不可少的事勢，然而我們絕對不能認為救国衛民的战争，其理由：（一）在邏輯上，只有反国际帝国主义反軍閥的战争，可以全称肯定他是为国为民，至若“反直即是为国为民”，我們实未能加以承認；（二）軍閥自身的性質与环境，在客觀上亦无由实现他为国为民的余地；（三）在他們政治的行为上，一向連为国为民的傾向也沒有，出兵宣言中虽然抬出抽象的正义与民意，直軍討伐安福奉張时，更說得詞严义正，自来口說无憑。所以此次战争，我們只能承認是直与反直的軍閥战争，只能承認是帝国主义与軍閥重苦吾人民之較前更大的慘杀。

因此，我們可推定此次战争之結果：第一，直胜，則美国将扶助直系在中国政治的統一压制，以成就美国在中国經濟的統一侵略。第二，直敗，則为日本势力結合安福奉張，支配中国的政治經濟。我們对于前者固深恶痛絕，对于后者又豈能欢迎！無論前者后者，外力侵入断送国家生命的慘痛都是有加无已，内部战争屠戮人民牺牲人民的慘痛也都是有加无已。

第三，假若双方势均力敌勝負不分或直系形势大有不利时，則野心勃勃的美国帝国主义必然發起干涉中国內政，以圖达到共管目的，其形式必然是勒令双方听命于列强強制的和平會議之下，組織买办式的商人階級与軍閥階級暂时混合統一的政府，而根本剿灭广

州和全国一切革命的进步势力。然而即使成功这样的局面，也是暂时的，各帝国主义之間与各軍閥之間不久仍要因利害冲突而爭斗，不过中国国家与人民的命运便要因此淪于万劫不复的地位！

所以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存在一天，即軍閥与战争的惨痛存在一天。我們要解除这种惨痛，固然不是空言哀求和平息战可以得到，也不是依賴何派軍閥战胜可以得到，更不是希望陰謀构成中国內乱以达到其壟断或共管的目的帝国主义之干涉可以得到。人民若希望此次任何一派軍閥之胜利，只有蹈直皖直奉战时希望吳佩孚得胜之复轍；若希望什么“友邦”出面干涉，只有步印度安南之后塵！我們对于双方軍閥不能存絲毫希望，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尤不可存絲毫希望，这种希望不仅可恥无效，而且要使自己 and 国家的命运更加凄惨更加危亡。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利与势力。只有这样才能免除定期的惨杀与战争，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永久真正的和平。全国被压迫的人民！你們看呀：外国帝国主义剛剛构成这次內战，同时他們在華盛頓与倫敦之間便發起（由美国發起）干涉中国內政，采取强制号召各势力派和平會議的方式来亡中国。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呀！亡国的惨禍是由这次外国帝国主义构成的內战临头了！你們尚可希望軍閥給你們以“正义”，帝国主义給你們以“和平”么？起来！起来！

打倒侵略中国构成內战的一切帝国主义！

打倒屠杀人民供外国帝国主义利用的一切軍閥！

全国被压迫的人民联合起来！

原載“响导”周报第82期，1924年9月10日出版。

中共中央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張

(一)

此次北京政变之后，在国内政象上，一方面表现出反直派在北方之胜利，将回复到直皖奉直战前安福交通执政的局面，一方面表现出直系在中部仍保有其地位；同时，在外交上，一方面表现出英美帝国主义者不能独力挟曹吳攫取全中国，一方面表现出日本帝国主义者也沒有挟段（祺瑞）張（作霖）統一中国之可能。

(二)

帝国主义者宰制中国之企圖，約分为三时期：第一时期是所謂瓜分政策，由帝国主义的列强協議在华势力范围之划定，华盛顿會議以前，均屬此时期；第二时期是所謂共管政策，由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者协力共同宰制中国，自华盛顿會議至今年7月倫敦會議，均屬此时期；这两种政策，均因为帝国主义的列强間在华利害之冲突不能成为事实，遂进入第三期，即現在之分立政策。

这种分立政策，和第一时期不同者，只是不取列强間协定形式及表面上避去瓜分之名，而实际上乃是帝国主义者各在其势力范围内——日本在北方，英国在中部，法比在其他方面，——集中当地軍閥之力，由經濟的支配权力，进而各造其自己支配的政治机关，实行分裂中国。

独有后到的美国，一面因为其国内經濟力特別优裕——余資余貨——之故，一面因为在中国尚未有独占的势力范围，遂極力鼓吹

什么“在华开国际會議討論施行于中国之一种道威斯計劃”，以圖寻得相当的机会与工具——游移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外的軍閥，达到其以經濟力宰制全中国之野心。

(三)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此时不得不大声疾呼，警醒国民，勿固执从前的預料与恐怖，以为帝国主义者宰制我們只有瓜分与共管两个死板方式，應該覺察他們希圖宰制我們的別有新而更毒的方式：分立或道威斯計劃。前者比后者更有实现之可能，其危險更迫在目前。

此种政治的分立，即是国家的民族的分裂，也即是帝国主义者瓜分中国的計劃之实现。挽救此迫在目前的危机之方法，不是各省軍閥的和平會議或国是會議，也不是几头元老的善后會議，乃是本党去年北京政变时所主張的及中国国民党現在所号召的国民會議，只有这种国民會議才可望解决中国政治問題；因为他是由人民团体直接选出，能够代表人民的意思与权能。

我們希望国民党領袖們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會議，并須努力使他們所主張的国民會議預备会急速在北京召集，更应極力反对軍閥們拿什么各省軍民长官會議来代替此会，执行此会职权。此預备会之任务不但是籌議国民會議，我們更应号召各階級的民众及与各派帝国主义者尚无确定的关系之武力，拥护此預备会，在正式政府未成立以前，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

此临时国民政府（一）为挽救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危机而成立，自应不妥协的打破各派軍閥勾結帝国主义者分裂中国之势力；同时，也应杜絕帝国主义者勾結軍閥借口援助中国統一实行其道威

斯計劃之陰謀。(二)依賴各階級的民眾及與帝國主義尙無確定關係的武力之擁護而存在，至少也應採用國民黨綱為施政方針，方能得農工兵等民眾的同情。

(四)

此臨時政府如果成立，本黨當然不能妄想他是國民革命左派的政府，或甚至還不是中派；然而我們却準備贊助他，只要他確能防止帝國主義者分裂中國或共管之陰謀，只要他確能鎮壓一切反革命的軍事行動，只要他不妨礙一切平民參與政治之機會。

(五)

為全民族的解放，為被壓迫的兵士農民工人小商人及知識階級的特殊利益，本黨將向臨時國民政府及國民會議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同時本黨認定擁護這些要求，是一切人民及其代表之責任，尤其是國民黨之責任。要求如下：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第一重要是收回海關，改協定關稅制為國定關稅制；因為這是全民族對外的經濟解放之唯一關鍵。

(二)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罷工刑律，保障人民集會結社出版言論罷工之無限制的自由權；因為這是人民對內的政治解放之唯一關鍵。

(三)全國非戰時的常備軍，均以旅長為最高級軍職，廢除巡閱使督軍督理督辦總司令檢閱使護軍使鎮守使軍長師長等軍職；因為這是杜絕軍閥勢力集中盜國亂政之重要關鍵。

(四)軍閥之禍，罪在最少數高級軍官，失業入伍的兵士們所

受压迫与困苦，与其他一切平民等；今后旅团司令部，应采用委员制，軍餉公开；应改良現役兵士之生活及教育；兵士退伍，須給以土地及农具或他种确实可靠的生活。

(五) 規定最高限度的租額，取消田賦正額以外的附加捐及陋規，謀农产品和他种生活必需的工業品价格之均衡，促成職業的組織（农民协会）及武装自衛的組織，这都是农民目前急迫的要求。

(六) 八小时工作制，年节星期日及各紀念日之休假，最低限度的工資之規定，廢除包工制，工厂衛生改良，工人補習教育之設施；工人死伤保險法之規定，限制童工之年齡及工作時間，女工妊孕前后之优待，这都是工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

(七) 限制都市房租加租及建設劳动平民之住屋。

(八) 沒收此次战争禍首的财产，賠償东北东南战地人民之損失及救济北方水災。

(九) 各城市乡鎮之厘金牙稅及其他正杂捐稅，在国庫收入无多，而小本营商者則因之重感困苦，宜一切廢止。

(十) 廢止盐稅米稅以裕民生計。

(十一) 增加海关进口稅，整理国有企業之收入，征收遺產稅，征收城市土地稅。此等大宗稅收，不但足以补偿廢止旧稅——厘金牙稅盐稅米稅田賦附加稅及其他各种正杂捐稅——之損失，并可用为補助退伍兵士失業貧农及推广教育之經費。

(十二) 为保障知識階級之失業及青年失學計，国家預算中，不得將教育經費移作別用，并应指定特种收入如收回

庚子賠款等，为实行中小学免費优待小学教員及推广平民教育之用。

(十三) 妇女在政治上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会地位上，均应与男子享平等权利。

原載“响导”周报第92期，1924年11月19日出版。

中國工人階級的力量^①

鄧中夏

自从国际資本帝国主义侵入之后，中国宗法社会的小农及小手工業經濟日益崩坏，新式工業經濟日益發达，因此，我們无产阶级在这当中也就随之日益發展而成长壮大了。

在初，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原不过只欲銷售商品和取得原料，本不欲中国新式机器工業有大規模的增进与發达——因这会起殖民地的工業对宗主国的工業剧烈之竞争对抗，以至于排斥的。所以那时帝国主义只容忍中国本国的“商業資本”之存在，至于本国的“工業資本”，那是他們所引为隱憂、引为大患而在所必斥的。

本国的商業資本家漸漸学会組織生产，發展了所謂“家庭工業”（如商店散給小戶女工以絨繩洋綫而令其織腊帽手套等）和“工厂手工業”（如手机的小工場等），这些小小生产因与帝国主义无多大的妨害，亦为它們相当的容讓。

但是，自从鴉片之战以来，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压迫实在太猛了，使得中国不能不起一种“自强御侮”的反感；那时帝国主义者間亦有互相傾軋的裂痕，中国政府得利用这些机会購入机器以制炮造艦，于是就成就了中国的“軍用工業”。

再則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之侵略，除掉投貨，还要投資，这是它的本性使然；故当时鐵路投資为各帝国主义者所垂涎欲

① 原題为：“我們的力量”。——編者

滴、爭先恐后的。此外，它們還有採取煤鐵和將商品輸入內地的需要。故借款官營，中國得以興修鐵路及開掘礦山。於是又成就了中國的“交通工業”“煤礦工業”。

隨後因機器既已輸入，又引起中國本國資本發展的自然要求，而興工製造；並且外國資本利用中國勞力的低廉，原料取携的便利，運輸周折的免除，海關定稅的減輕，亦宜於在華設廠製造；因此而本國資本的和外國資本的各業製造工廠也就如雲而起了。於是終於成就了中國的“製造工業”。

中國的工業是在這些原因上發展起來的。帝國主義雖不能容忍，然而為投資、投資、掠奪富源，又不得不使中國建立相當的工業。誰知工業化的速度是與無產階級之長成壯大成正比例的。中國的無產階級公然因三、四十年来工業之進展而組成一個雄厚而偉大的隊伍，掉轉頭來便向帝國主義舉行“背叛”，舉行反攻。這那里是他們始料所及的事哩。

現在且把我們的力量，先來檢查一下。

二

首先檢查我們的總人數。

說到這個問題，使我感到無窮困難的，就是沒有精確而完備的統計可資依據。現在只好把比較可靠的略為說說。

先前我們說中國所有產業工人總人數是六十一萬人，這是根據農商部民國七年（1918年）的統計估量而定的；可是民國七年到現在又是六年了，這六年之間，工廠增加不少，故我們有時鼓着勇氣大胆猜度說：總加至八十萬人了。其實這是錯的。農商部統計所指六十一萬人完全是製造工廠工人，而鐵路工、礦工、海員、市政工、碼頭工、車輛勞動者、農業工人，以及政府直轄的造幣廠、造船廠、

兵工厂等工人和依外国法律注册的工厂工人均不包括在内。

据我们最近的考订，中国所有产业工人总人数是一百八十五万余人（手工业工人当然不在其内，合手工业工人总人数据农商部民国四年〔1915年〕的统计，是一千余万人）。兹分述于下：

制造工厂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因其时南方护法军兴，川、湘、粤、桂、滇、黔六省无从调查，所以缺而不全。我们现在还是根据民国四年的统计较为完全。该统计民国四年填注的制造工厂工人总数是六十四万八千二百七十五人。民国四年以后，工厂增多无数，现在总人数当然还有增加。

铁路工人 交通部民国八年（1919年）的统计，所有国有各路人员总共是七万三千六百五十一人（外有建筑人员二千二百七十四人未算在内）。现将非工人如会计处九百四十人；车务处的管理员、巡查员等一百六十人，站长六百三十八人，副站长、电报生、车站司事等二千二百七十二人；机务处视察员、段长、工厂工头三百九十七人；养路工程处视察员等七百零七人，共五千一百一十四人除外，加上建筑人员，铁路工人实数总共是七万零八百一十一人。但有数点须注意的：（一）这里数目仅限国有铁路而言，其余省有的江宁路、民有的潮汕路等和外国建筑的如南满路、滇越路等尚不在内。（二）就是这数目恐有不尽确实之处，就中如机务处工匠（即铁路附设工厂的工匠）据该表细数长辛店机器厂工人仅填七百四十五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三千以上的数目相差太远；又该表江岸机器厂工人仅填三百七十二人，与我们所知道的有二千人上下的数目又相差太远。以此类推，其他各项数目当亦有不尽确实的。（三）铁路附设工厂和修路有采用包工制，这些包工，路局是无法按名注册的。所以铁路工人如果一人不漏，当然还有增加。

矿山工人 农商部民国七年的统计，是以工数计算，探矿采矿